

Literary Prize Winners



- Sully Prudhomme 1901
- Theodor Mommsen 1902
-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 RUDYARD KIPLING 1907
-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908
- PAUL HEYSE 1910
- MAURICE MAETERLINCK 1911
- GERHART HAUPTMANN 1912
-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 KARL ADOLPH GJELLERUP 1917
-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 CARL SPITTELER 1919
- KNUT HAMSUN 1920
- ANATOLE FRANCE 1921
- GRAZIA DELEDDA 1926
- HENRI BERGSON 1927
- SIGRID UNDSET 1928
- SINCLAIR LEWIS 1930
-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 JOHN GALSWORTHY 1932
- LUIGI PIRANDELLO 1934
- EUGENE O'NEILL 1936
-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 PEARL S. BUCK 1938
- JOHANNES V. JENSEN 1944
- GABRIEL GARCIA MARQUESA 1982

#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63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HEINRICH SACHS 1966

ERNEST HEMINGWAY 1954

THOMAS WHITE 1973

WISLAW SZYNDLER 1974

HAROLD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VICENTE ALEXANDRE 1977

HERBERT ASHMOLE 1978

ELIAS CANETTI 1981

WILLIAM GOLDING 1983

OSAMU DAZO 1984

CLAUDE SIMON 1985

WOLE SOYINKA 1986

JOSEPH BRODSKY 1987

## 邪恶之路

(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意大利] 格拉齐娅·黛莱达 / 著

黄文捷 / 肖天佑 / 译

漓江出版社



·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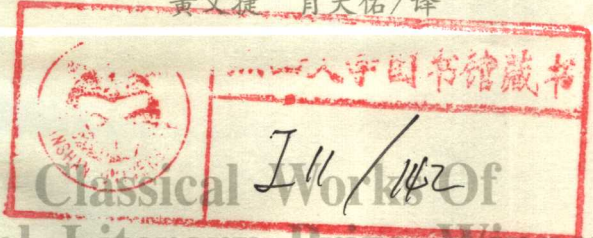
主编 / 刘硕良

# 邪恶之路

(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意大利] 格拉齐娅·黛莱达 / 著

黄文捷 肖天佑 / 译



05  
10  
13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65



〔意〕黛莱达(女 1871~1936)  
(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 凄丽沉婉，含蕴深深

吕同六

格拉齐娅·黛莱达 (Grazia Deledda)，是一位富于艺术魅力的女作家。

在 20 世纪上半叶灿烂辉煌的意大利文学星座中，黛莱达是一颗闪着奇特光彩的星星。

黛莱达的故乡是撒丁岛。自古以来，撒丁就是一个偏僻、闭塞、穷困和落后的海岛。学者们在描绘意大利文学地图时，似乎常常忽略了撒丁岛这块贫瘠、荒漠的土地。然而，黛莱达这个在撒丁岛土生土长的女子，却从这里走向意大利，走向世界，以她多姿多彩、独具风韵的创作，丰富了意大利和世界文学的宝库。

1871 年 9 月 27 日，格拉齐娅·黛莱达出生于撒丁岛的努奥罗城。她的祖父以制作圣徒像为生。父亲是自食其力的农庄主，他膝下有六个孩子，黛莱达排行第四。父亲曾用撒丁方言写过一些诗篇，他生平慷慨豪爽，时常接待因出差或参加宗教活动来到努奥罗的亲朋好友，留他们在家里小住。因此，格拉

齐娅从小便广泛接触到三教九流的过客，他们在作家日后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身上留下了自己的面影。

格拉齐娅·黛莱达只在小学念了四年书，便被迫辍学在家，因为按照撒丁岛的封建礼教和古老习俗，不允许女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她眼睁睁地看着兄弟桑图斯享受特权，进入高等学府读书。她为此羡慕不已，后来在自传体小说《柯西玛》中不胜感慨地回顾了这段伤心的往事。

格拉齐娅身处与世隔绝的海岛，但她怀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好在她的父亲尤其是当神甫的叔叔藏书相当丰富，于是她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和文艺作品。德·亚米契斯、卡尔杜齐、邓南遮、大仲马、爱伦·坡、哈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热，都是她喜爱的作家。父亲又请了一位中学教员，给她讲授意大利语。这位教员常常出些题目让她作文。聪慧过人的格拉齐娅写的一些作文如此出色，以至老师鼓动她送给刊物去发表。当时她年方十三岁，压根儿不懂得怎样投稿。凑巧她手头有一份杂志，便按照上面标明的地址，寄去了一则速写，竟然很快就登了出来。黛莱达便这样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此，黛莱达更加勤学苦读，既习作写诗，又试写小说。几载寒窗，终于收获了第一批硕果。1888年，黛莱达十七岁，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山上》发表于罗马的《儿童的天堂》周刊。翌年，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童年轶事》。这两个短篇于1890年合集为《在蓝天》，在都灵出版。她同时为多家刊物撰稿。1888年，她又在罗马的《新潮》杂志刊出短篇小说《撒丁人的血》。随后，她又闯入中长篇小说领域，在报章上以连载形式发表《秋天的故事》、《东方的星辰》（1891）、《爱的

报复》(1891)、《撒丁岛的精华》(1892),等等。这些乡土气息浓郁的作品,引起文学界,特别是真实主义理论家、作家卡普安纳的注意。

长篇小说《邪恶之路》(1896)的问世,使黛莱达声名大噪,标志着她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以爱情与道德、罪与罚的冲突为切入点,展示了撒丁岛古老的文明和宗法制下的乡村生活,以柔婉清逸的笔致去叩动读者的心弦。这种对于意大利文学来说颇为新颖别致的题材和风格,从此成为贯串黛莱达众多作品的一根红线。

1899年10月,黛莱达前往撒丁岛首府卡利亚里旅游,在朋友家中住。在那里,她结识了在财政部任职,从罗马出差到卡利亚里的帕尔米罗·莫德桑尼。两人一见如故,互相倾慕,翌年1月便结为伉俪。三个月后,黛莱达便随丈夫迁往罗马,在那儿定居,直到去世。

从穷乡僻壤的撒丁岛来到意大利政治、文化的中心罗马,在黛莱达面前不啻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她广泛交游文艺界人士,了解意大利和欧洲文学发展的态势,从而得以从新的文化高度,以开阔的视野,审视和表现撒丁岛的历史和现状、社会和文化。《埃里亚斯·波尔托卢》(1900)、《常春藤》(1908)、《风中芦苇》(1913)、《玛丽安娜·西尔卡》(1915),便是黛莱达文学创作盛期结出的硕果。

黛莱达一生勤奋笔耕,同时,为了抚育儿女,操持家务,她又不辞劳瘁,克尽厥职。她曾解嘲地自称是“一个沉默寡言而又喜欢舞文弄墨的家庭妇女”。在五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她总共写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五十余部,真可谓著作等身。她在诗歌、戏剧领域也显示了难能可贵的才华,

还翻译了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她的声誉越出了撒丁岛和意大利半岛，赢得了各国读者的欢迎。1926年，黛莱达因“那为理想所鼓舞的作品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以深刻而又同情的态度处理一般人类问题”，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6年8月15日，黛莱达在痛苦地病卧了一年之后，逝世于罗马。她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自传体小说《柯西玛》，1936年9月至10月在《新文集》连载，单行本于1937年问世。

《邪恶之路》的写作始于1892年底，历时几近一年，1893年11月完成，1896年出版。嗣后，小说几经修改，1916年发表最后的修订版，内容几乎全部改写。本书就是根据1916年版译出的。

《邪恶之路》初版问世，比黛莱达早期的爱情小说《撒丁岛的精华》略晚几年。然而，无论是情感的剖析，还是小说的风格，都趋于成熟了。

19世纪末叶，现实主义在意大利文坛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流派的作家通常把目光投向故乡或自己最熟悉的地域，着力描写下层人物的命运遭际，暴露社会的阴暗面，追求环境、细节和语言的真切自然。黛莱达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氛围中成长，受到它的熏陶，她的小说中自然可以见出这一流派的特色。另一方面，某些现实主义作家又热中于描绘富有乡土情味的传奇性故事，例如邓南遮在早期创作中作为真实主义者便对他的故乡——贫瘠的阿布鲁齐地区的牧人生活，做了诗意的美化。这种影响也在黛莱达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然而，黛莱达摒弃了邓南遮把具有认识价值的材料化为一种艺术修饰手段的倾向。她已不再倾心于使小说成为富于民间色彩的抒情“文献”，而

是着意让小说表达一种道德意识,着意展示古老的撒丁岛的社会—文化品格。

《邪恶之路》是一部写爱情与道德冲突的小说。作品的情节是在一个世代务农但渴求进入资产者圈子的家庭里展开的。她,玛丽亚,是主人;他,彼特罗,是长工、仆人。他们彼此相爱了。他们被一种狂热的情感所吸引、所陶醉,他们渴求的爱把两颗滚烫的心拴结在一起。

但是,社会地位的差异,使得男女主人公之间有一条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一种阴暗的、悔恨的感觉,开始折磨他们,把他们痛楚地分开,特别是玛丽亚,她的狂热情感不时被一种救赎罪过的痛楚意识所压抑。爱的情感与罪孽感之间的冲突戏剧化了。

玛丽亚虽然爱着彼特罗,但终究还是嫁给了有钱有势的财主弗兰切斯科。婚姻成了进入资产者圈子的敲门砖。年轻女主人的背叛,使彼特罗身上原始的本性苏醒了,他痛苦地渴求“血与泪”。他受难以驾驭的野蛮情爱驱使,怀着野蛮的仇恨,实行报复,杀害了情人的丈夫。

如果说,在黛莱达青年时代的作品中,爱情题材充溢着浓郁的幻想色彩,情爱是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来表现的,只有罪过本身才能使人挣脱这种命运的摆布,爱的情感无论在心理刻画和道德剖析方面都没有获得深化;那么,随着作家的道德意识和艺术意识的强化,在她的爱情题材小说中,救赎罪过的必然性也大大强化了。

诚然,在《邪恶之路》中,情爱也始终是作为一种命运出现的。它把男女主人公卷入了情感冲突的漩涡。然而,作为情爱的对立面,黛莱达又写了忏悔和赎罪意识,以表达作家的道



德评判，借助忏悔和赎罪意识的痛苦来荡涤和解救灵魂。特别是在女主人公身上，救赎意识获得了最强烈的展示，在小说中渐次演化成为主旋律。

小说的最后部分，情节以急速的节奏展开。守寡的女主人嫁给了她从前的仆人，如今因为获得一笔来路不明的、可观的财产而发迹的彼特罗。一双苦恋的情人终于喜结良缘。然而，这姻缘却远不是花好月圆般地美满。种种反常的迹象，使玛丽亚醒悟了，彼特罗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她感到恐惧，但同时，一种赎罪的意识又立即占了上风。她隐隐约约觉得，正是她同彼特罗的情爱，迫使彼特罗走上了邪路，正是为了她，彼特罗才犯了罪。因此，她实际上也已堕落为凶手的同谋者。在经历了揪心的痛楚折磨之后，玛丽亚终于把自己的痛苦与彼特罗的痛苦融为一体了。从此，他们的命运就永远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再也不可能分离了。

此刻，玛丽亚不禁回忆起，有一回，她瞧见一群罪犯排列成长队，被遣送到服刑的地点去。这些罪犯每两个人排成一行，被锁链铐在一起，蹒跚地朝前走着。她和彼特罗如今不正跟这些不幸的罪人相差无几么？他们俩被一条情爱和罪孽铸成的铁链系在一起，径直朝着惩罚他们的同一个地点走去。

正像任何一名医生都无法治愈他们的病症一样，任何一名法官都无法判处他们比他们已经蒙受的惩罚更为严厉的惩罚。

这就是作家为这个伤感哀怨的爱情故事刻写的最后一笔，凄清感人而又含蕴深沉的一笔。

不难看出，在《邪恶之路》中，爱情题材的描绘包蕴着无比丰富、复杂的情感，愈来愈着重展示爱情引发的戏剧性纠葛，展示罪与悔罪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在内心世界激起的剧烈

冲突。作品的伦理性愈来愈鲜明、突出,心理探索愈来愈显露出犀利的锋芒。作家同时又摒弃自然主义的手法,回避直接描写报复的场面。这一切,都是作家思想上、艺术上成熟和自信的标志。

《邪恶之路》仍然流露出浪漫主义的情调,例如,作者不时用纤细婉约的文笔描绘悲痛、失望、苦恋、梦幻等等。读者在小说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撒丁岛民间传统的魅力。这构成了黛莱达小说抒情氛围浓郁的特色。她对原始的民间迷信的出色描写,展示出了这种迷信具有的神秘的根源,它孕育了撒丁人那种严酷的性格特征。

但是从整体上看,小说的风格是现实主义的。对人物心态,对现实环境,对自然世界,黛莱达所作的种种描画,已消除了早年创作中的奇异的、浪漫主义的情调。温馨的农家生活,四季农家劳作的节拍,清新、静谧的乡村,美妙的田野风光,富于宗法制色彩的古朴的民情民俗,鲜艳多彩的服饰,人物的音容笑貌,都得到真切乃至精细入微的描绘。而这种真切的描绘,全是为了对人物和环境作尽可能真实可信的阐释。因此,《邪恶之路》这部小说既打上了真实主义的印记,又体现了黛莱达独具一格的抒情心理小说的风韵。

黛莱达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埃里阿斯·波尔托卢》,1900年8月至12月在《新文集》上连载,1903年出版单行本。

埃里阿斯是小说的主人公,占据小说的中心位置。黛莱达只是用寥寥数笔勾画了他的相貌与性格特征:一个漂亮和软弱得像女人的小伙子,但却气韵生动地展现了这一性格特征整个发展历程。

埃里阿斯优柔寡断,很容易受诱惑,他因为早年交上了坏

伙伴而锒铛入狱，备尝铁窗之苦。他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因此很警惕，努力避开诱惑他的危险。然而，他出狱之后，偏偏遇上了充满火一样地热情、年轻美貌的嫂嫂玛达莱娜，而且玛达莱娜又向他寻求帮助。此时，他隐约觉得自己再也无力摆脱命运的召唤了。

从小说的第一页开始，黛莱达就描写盲目的、不可遏止的情欲如何摧毁了一切抵抗。这种盲目的、不可遏止的情欲犹如一张编织紧密的情网，心理与道德之网，沉沉地罩住了男女主人公。作者以简洁的文辞，洗练的笔法，丝毫不加修饰地描写这种情欲。埃里亚斯和嫂嫂之间燃起的汹涌的爱之火焰，势不可挡，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同它的搏斗似乎是徒劳无益的。埃里亚斯挽救自己的希望越来越黯淡了，他的抵抗也越来越软弱了。

整部小说围绕着这一情欲的轴心展开，其他一切成分都被推移到了次要的位置。在艳丽夺目的情欲之火面前，一切都黯然失色了。从最初的时刻起，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便是陶醉、幸福、希望，同时也是悔恨、罪过、失望。因此，作家便营造出一种甜蜜中浸淫着忧伤、昂扬中蕴含着压抑的氛围。

同《邪恶之路》比较，在《埃里亚斯·波尔托卢》中，罪过的意识更加尖锐，更加痛苦。在男主人公激荡不安的心灵中，罪过意识始终同爱的情感，同其他阴暗、可怕的情感，同邪恶的情感、沉沦的情感，错综纠结。埃里亚斯感觉到，对于他来说，倘使生活的欢悦一旦消失，便将爆发同嫉妒、罪过、悲苦搏斗的内心剧痛，他的心灵世界，他周围的现实世界，便将笼罩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

埃里亚斯朝沉沦迈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剧烈的、丰富的

内心冲突。值得指出的是,黛莱达是以严峻的道德责任感为尺度,来描绘主人公微妙心态的。她把一个无力自拔、始终被情欲主宰的人思想感情上的起伏,写得波叠浪涌而又脉络清晰。当埃里阿斯和玛达莱娜的目光不期而遇的时候,他们的呼吸仿佛停止了,一种震颤,一种使人头晕目眩的欣悦,使他们飘飘然,忘乎所以。此刻,情爱在埃里阿斯身上压倒了一切,化为一种梦呓,理性被窒息了,沉默了。一切在此之前被认为是罪过和痛苦的东西,而今他觉得是权利、幸福;一切在此之前唤起他恐惧的东西,而今不可抗拒地强烈吸引着他。

然而,这情欲又是命中注定的,剥夺了他不想再堕入罪过的希望。他觉得,他现在爱玛达莱娜爱得要命,只要一有可能他便会重蹈覆辙,一想到这里,他便害怕得毛骨悚然。如果说在此之前,爱的情欲曾给他带来比死亡更阴暗的痛楚,那么,在现在同恶的搏斗中,情欲已把他牢牢地攫住了,把他像一片树叶那样扔进了漩涡。他的眼睛已然是冷漠的,充斥着恶意,他的脸孔因情欲和罪孽而憔悴、干枯了。

经过苦苦思索之后,埃里阿斯做出了去当神甫的决定。这给他以解脱,使得他在遭受暴风雨侵袭而丧失抵抗力之后,获得了片刻的喘息。如今,他怀着一种圣洁的心情想着玛达莱娜,在这短暂的日子里,他不再感到悔恨、恐惧与厌倦,他的心灵笼罩着宁静。

其实,在他披上神甫的长袍之前,他仍无力割断七情六欲,仍受自己软弱的性格牵制。世俗的爱和圣洁的意念,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时时发生撞击,在他宁静的心湖中掀起波澜。他依然被他那获得满足的情欲,被他那可怕的幸福回忆所吸引,要知道,这是他在生活中获得的唯一幸福。他爱他和玛

达莱娜生的孩子，他站在奄奄一息的哥哥，即玛达莱娜的丈夫，众人皆以为是那孩子父亲的人病床前，禁不住黯然神伤，心中苦涩难言。但他又真诚地确信，他虽然希冀哥哥死去，但他绝不被撒旦压倒；他的躯体虽然脆弱，但撒旦绝不能战胜他的灵魂。

哥哥死后，充满诱惑的梦又攫住了埃里亚斯，那甜蜜的、不再是罪过的爱又展现在他眼前。不过，他到底还是战胜了诱惑，抵住了玛达莱娜对他的执拗请求，毅然当了神甫。

然而，尘世的情感仍然藕断丝连，纠缠着他。如果说他对玛达莱娜的情爱已经熄灭，那么，他对儿子的父爱仍然折磨着他，这是一种充满温柔、渴求和嫉妒的爱。玛达莱娜即将再嫁，而他的儿子也将成为另一个男人的儿子，再也不会认他为父亲。孩子的猝死，标志着埃里亚斯终于从尘世的情欲中解脱出来了。在病危的孩子面前，他终于重新获得了他以为已经永远失去的宁静。他的灵魂得到了净化。

黛莱达以工笔描写之势，把一则爱情故事表现得绵邈深情、凄丽沉婉。读毕掩卷，一缕幽怨犹余音袅袅，它促使读者怀着一颗不平静的心去咀嚼，去思索。

黛莱达透过主人公情感世界的剧烈冲突，在罪过意识的层面上表现了一幕伤感的爱情悲剧，叩动了读者的心弦。但她并不止于这一层面。她又紧紧把握住主人公性格世界的尖锐矛盾，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揭示了意蕴深邃的内涵，升华了小说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是的，埃里亚斯曾真诚地、不可遏止地渴求爱情和幸福，可是懦弱的性格却迫使他不得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他曾下定决心，要对旧礼教旧思想拼力作斗争，可旧礼教旧思想却像撒丁岛莽莽苍苍的高山，沉重地压迫

着他，逼迫他惶恐地救赎罪过。埃里阿斯是自身懦弱的性格的牺牲品，是撒丁岛千年旧礼教旧思想的牺牲品。这样，撒丁岛的历史与现实，在悲剧性的爱情故事里，在人物复杂与变化的心理云彩的背景上，都投下了浓浓的阴影。

黛莱达以淡雅清冽的笔致叙写这一动人心曲的情感悲剧，洋溢着诗情。她又以清丽秀润的笔触描绘多色多姿的自然景色，充满了画美。在小说中，自然同人物浑融无迹，诗情与画美冶于一炉。自然景色同人物感情一样浓烈。情感在景物中映显出来，不时给景物晕染上各种色彩。这是粗犷的、蛮荒的撒丁岛景色，它像一面广阔无垠的镜子，始终参与和映照戏剧冲突，从而使情感的戏剧获得有力的共振。

《埃里阿斯·波尔托卢》显露了从现实主义向抒情的社会心理小说的过渡。而短篇小说集《变迁》（1912）和长篇小说《风中芦苇》（1913）、《玛丽安娜·西尔卡》，则是完成这一转折后的重要收获。

《玛丽安娜·西尔卡》最先于1915年在《阅读》杂志上连载，同年出版单行本。

黛莱达在这部小说中似乎要对贯串她许多作品的情爱—罪过、情爱—悔罪的主题予以总结，在更沉深的层次上予以抒情化。

青年西蒙内是落草的强盗，过去是年轻、富有的女主人玛丽安娜的仆人，而且早已深深爱着她。在分离多年后，这一对青年恋人重新见面了。女主人与仆人相恋相爱。情爱是无法抗拒的命运这一命题，在《邪恶之路》中曾经构成全部情节的核心，而在《玛丽安娜·西尔卡》中似乎又再现了。不错，作家铺张笔墨，细吹细打，着意渲染了这一情爱无法圆满实现的悲

哀；然而，戏剧冲突的重心，却是落在西蒙内这个被法律排斥于社会之外的强盗的境遇，以及由这一地位而在主人公们内心引发的骚动、激愤和失望的复杂情感上。

故事在两个不同的平面上推进，围绕西蒙内和玛丽安娜这两个遭遇、处境迥然不同的主人公，情节交错展开。西蒙内落草为寇，过着流放似的生活，他的天地是孤静的原野，是蛮荒的不毛之地。这个自由的王国，或遭遇狂风骤雨的侵袭，或在悲凉的辽阔中显出冷寂，或展露出大千世界明朗的美。西蒙内的心境，正同这样的环境与场景丝丝入扣。他忽而觉得，潜伏在他心里的那头残酷的野兽苏醒了，像翻江倒海似的，把他的内心世界搅得不得安宁；他忽而又觉得，他对玛丽安娜的爱是纯洁的，这种纯洁的情感使他的心境趋于平静、开朗。

而在玛丽安娜的内心，情感的种种冲突却深藏于表面的冷漠，深藏于日复一日的漫长相盼，深藏于看似平静实则充满希望、焦虑和恐惧的等待之中。她的岁月，已化作一个等待的梦。同玛丽安娜此种喜悦的憧憬与忧心忡忡互相交织的心境相呼应，黛莱达描绘出一幅田园诗般静谧、透明的风光，就像这对长别离的情人在棚屋中重逢时的场景：夜是那么温暖而明朗，树林上空的星星显得那么亲切，仿佛一抬手就可以把它们摘下来；周围的一切，青草、树叶、花朵，散发出甜蜜的芳香。作家时而又勾画出阴暗的、好像灾祸即将来临的景象：在空旷的街道那一边，在教堂的暗红色钟楼上空，浮游着一朵像火一样血红的云彩，一切全是昏暗的、血色的，燃烧着一种神秘的火焰。

黛莱达倾力刻画的玛丽安娜，是一个异常丰满的艺术形象。她以坚毅、果敢的态度捍卫自己爱的权利，坚持爱的选

择；各种矛盾与冲突，情绪的变化转换，充斥她的内心世界，使她的内心世界比她外露的情感要丰富得多。她把自己禁锢于爱，禁锢于日益成为痛苦的爱。她感觉到，那痛苦的失去希望的情爱，已经命定地把她和西蒙内连接在一起了。

有人兴许会产生一种错觉，从开卷直到悲惨的结局，《玛丽安娜·西尔卡》是一部静态的小说。事实上，这部小说却因洋溢着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纠葛而富于不同寻常的活力。无论是玛丽安娜醒悟到自己和西蒙内之间的距离，终于从自己难以实现的梦中苏醒，恐惧突然攫住她的心灵时，还是她暗暗执著地确信，她有能力克服一切障碍，去实现那个等待的梦时，无论是她偶尔沉浸于情感的甜蜜还是她意识到可怕的责任感时，或者两位主人公在悲伤之中都感觉到心灵的创伤难以愈合，生出重新远远地分离，从此再也不相逢的愿望时，读者的心都始终被女主人公曲曲折折的遭际和叠波涌浪的情感所打动，所震撼。

相比之下，西蒙内的形象不及玛丽安娜那么光彩。他不是那种能赢得人们尊敬，或是让人们害怕的强盗。当局并没有悬赏捉拿他，因为他从来不曾杀害善良的基督徒。他沦为土匪，只是为了帮助清贫的家庭。他平时打家劫舍，只跟真正的落草生涯沾上一点边儿，他倒是打心眼里羡慕那些令人生畏的强人。黛莱达摒弃浪漫的情调，避免把他写成那种残忍而又高尚、赚得少女们暗暗相爱的绿林好汉。西蒙内只是一个平庸的强盗，玛丽安娜爱上他，仅仅是因为童年时代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因为他具有一种男子汉的美，因为这个从前的仆人爱她这个女主人。

人们记得，在黛莱达的许多小说里，都写到男子汉的美，



但在她的早期作品里，这种描写更多地带有一种浮华的色彩，而在《风中芦苇》、《玛丽安娜·西尔卡》等作品里，对男主人公形貌的描写，从人物灰绿色的眼睛到光灿灿的目光，从高挑的身材到灵活而机警的举止，诚然还是那么精细，却不温不火，分寸恰当，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

西蒙内向玛丽安娜许诺秘密结婚，并立即去宪兵队自首，但他后来却不见了踪影。他犹豫了，动摇了，他不甘心为赢得一个女人的爱而放弃自己的自由，他因彷徨、爱和悔恨而沉沦。

主人公们经历的情感冲突，以不同的方式一一展示出来。在西蒙内身上，情感的冲突爆发为焦躁、愤怒；他的言语，他的举止，无一不像是—头苏醒的凶兽猛兽的表现。而在玛丽安娜身上，情感的冲突却得到克制，化为在内心竭力予以遏制的痛苦。

西蒙内虽然能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玛丽安娜，但是拒绝舍弃自己的自由；既然如此，玛丽安娜只好强忍满腔悲怆，抛弃一片痴情，打碎自己编织的等待的梦，永远地拒绝他，离开他。

在《玛丽安娜·西尔卡》中，对戏剧性的事件和人物的行为着墨不多，这就为景色描写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对山野风光和大漠雄姿的灵动形象的描画，填充了叙述的空白。黛莱达在这儿比在其他任何一部小说中都更加出色地用自然景色来刻画人的心境。上文论及玛丽安娜的情感世界时，我们对此已作了分析。作家笔下大自然的景象，同人物的心态时时处于一种对照而和谐的状态。作家没有花费很多笔墨去描写人物的行为，情节的展开似乎只集中于两位主人公不多的会面，人物的行为